

知難行易說的證明

賀麟

(一) 據知行的界說以證明

上節所檢出的種種對於知難行易說的批評，沒有一種是企圖根本推翻此說的，批評者共同點乃在於欲否認此說或欲將其普遍性；而只承認此說為具有部份真理的常識。他們所以會有此種誤解的原因，大約有二。一是，他們對於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十個證據有誤解，二是，他們看見中山先生只列舉許多科學常識作例證，便以為用常識作例證的理論，必仍是一種常識，沒有普通必然的教學。

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就是中山先生雖未曾給知行二字予以嚴密的定義，但在他的討論與論等十事的證明中，已將他所了解的知與行的意義解釋得異常清楚明確，多少已可算得我們所謂「據界說以思想」的方法了。至於他例證常舉的事例作證，乃是採切近思的方法，取其易於理解。而他的根本論證並不建築在常識上，乃建築在分析最近事實而求知行之本關係，以決定其難易所在之邏輯方法上。譬如，由分析冰浮於水上的最近事實，可以求得輕者上浮，重者下沉的道理，而可以確定地說「凡冰皆浮於水」。同樣，由分析製造豆腐和吃豆腐之行為，了解豆腐的化學原理之知難而淺近事實，可以知道凡知難於行或難行易的普遍道理。這是由分析特殊事實，得其本質所在，因而獲得普遍原則的方法。所以只要由分析最近事例，將知與行的意義確定清楚，予以明確的界說，即可以根據界說立論。如是，則例舉十大例證不為多，以其反復深證，足以增加讀者的了解與確知；即只舉一個例證亦不為少，因為即在一例證中，亦足以表明知行的普遍性質及其難易的根本關係。(按羅家倫先生著有「知難行易之科學基礎」一小時，又舉了許多科學的事例，多係心理學方面的，以證明知難行易。亦有可供參考處。不過，須知論證的邏輯效率，乃建築在對知與行的性質之規定。事例的加多，並不能

增加論證的力量。

所以中山先生在第四章裏所提出的十個例證，就邏輯意義言，只是一個方法，一個證明。我們可以稱之為據界說以證明的方法。因為在他所列舉的十個例證中，他已隱約地充分將知與行有性質或意義界說明白了。假如你接受了他的對知與行的界說，你必得承認他的知難行易的說法，有普遍的效率。我們試從他所提出的十證中去考察他對知行的性質之認識或界說。

就以飲食為證中，他所謂指是推動即動手尋常易行的動作。亦即「嬰孩一出母胎則能之，饑饉一脫補充則能之，無待於教」的本能行為。而他所謂飲食之知乃是指知食物之化學原理，知生理衛生之學，換言之，是指科學知識而言。今持科學知識與本能行為而比較其難易，則知必難行必易，尚有何問題？茲為方便計，試列表如左，以明知行之性質，及其難易之關係：

- | | | |
|--------|-----------|--|
| (一) 飲食 | 動手動手的尋常動作 | 知食物之化學結構，生理學，衛生學，知烹調的藝術原理 |
| (二) 用錢 | 日常用錢的習慣 | 知道或發明經濟學銀行學貨幣學 |
| (三) 作文 | 執筆為文，抒寫情意 | 知道或發明文法學與理則學 |
| (四) 建屋 | 建造屋宇之實際工作 | 知建築學建築設計及其對於實驗物理學經濟學美術學衛生學社會心理學之知識工程師之繪圖設計 |
| (五) 造船 | 工匠之施工建造 | 設計建築長城之精確計劃 |
| (六) 築城 | 築成萬里長城之工程 | 關於開鑿運河之設計測量，經濟學等知識 |
| (七) 開河 | 開鑿運河之工程 | 發明電磁學，新創製電機 |
| (八) 電學 | 使用電機之行為 | |

(九)化學 作豆腐製成醬油等事 發明並知道以上各工作之化學原理
(十)進化 人類利用進化原理，以改良 達爾文二十年苦心孤詣完成進化學
良物種，利用厚生，千百 說

年而不知其進行之為

上面十個事例，一貫地昭示我們所謂，知完全是指真知，科學知識，創造發明設計之知識。一般人所談泛泛淺近之知，道聽途說之知，空洞模糊之知，均不在他門了解的知之範圍內。所謂行是指不自覺的本能行為，普通運動五官四肢的簡易行為，依習慣而行，依命令而行，為需要逼迫，受知識指導的行為。把知與行兩個名詞所包合確定意義弄清後，則凡知必難凡行必易的道理，已可不言而喻。

中山先生所謂知難是指知事物所以然及其所當然之理難，求真知難，獲得學術之知難，主義學說的創始，學術的發明，事業的設計難。所謂行易是指不知而行易，知而後行亦易。就知行比較起來說，則獲得真知難於不知而行。由之而不知其進行的行易於知其所以然及其所當然之理的知。創立主義理解主義難於奉行主義。發明學理難於應用學理。設計及指導的工作難於依照計劃接受指導的工作。根據上面這種對於知與行的概念或意義的分析，即可斷言知難行易是一個有必然性與普遍性的說法，不僅是足以解釋初級事實的常識。這個學說乃純全基於分析考察客觀事實而成立的理論，不僅是有宣傳作用，有實用價值主觀的一時的說法。

這是真知難行易說最有力點，或最難意義，最符客觀事實的證明。這叫真知難行易的界說以證明，亦可叫做由真知與行的性質或概念之分析以證明。這個證明是十大例證所昭示的。所以十證實等於一證。除十大例證所發揮的主要證明外，中山先生復不厭反復詳詳，提出其他富於意義與教訓的證明。

(二)由可貴證難能

凡有價值者必難能，較少價值者必易為。難能故可貴，可貴固難能。這可以說為無可否的公理。假如我們確知知必比行可貴，則可據以證明知必比行難能。中山先生確曾於無意間探取了由知的可貴證知之難的理論。譬如以無線電為例，他指出用無線電通信，人人皆能辦到，即即無線電之發生，

與製無線電之工匠，亦不是什麼難能可貴的工作，「其最難能可貴者，即為研求無線電知識之人，學識之難關一過，則其他之進行，易如反掌矣。」研求無線電的知識人，較之機生工匠，顯然為可貴，足證前言之知較諸後者行為難能。他又附帶舉了西洋一件有趣的故事，最足以活潑地表明這層道理。據說有某家水管，偶生故障，請工匠修理。工匠一至，察出其源頭原因，毫不費力即將水管恢復原狀。索修理費五十五元零四角。家主問其故，工匠曰：五十五元為知識之值，四角為勞力之值。這可以說是由知識之貴於勞力，以證知識之難於行為的最好例子。

不用諱言地，說知識比行為難能可貴，已隱約包含了孟子「勞心者（知者）治人，勞力者（行者）治於人」的意蘊。因為孟子這句話早見到了勞心者貴於勞力者知難於行的道理。不過現代眼光看來，這話須得加以補充修正，就是勞心者未必即是貴族，勞力者未必即是平民。因為貴族不一定勞心，平民不一定不勞心。且近代生活的理想是勞心與勞力兼備而有適當之配合。艱勞心而不勞力，則祇體弱於偷惰，艱勞力而不勞心，則知識近於愚昧，均不見得難能可貴。又勞心者不必即是統治者，勞心者更不一定即是奴役勞力者之霸王，反之也許是解放或領導勞力者之領袖或共覺。無論何項職業，均需要勞心與勞力配合，無論何種事功，均需要勞心者與勞力者合作。且不僅「士」是勞心者，亦有勞心之「農工」。如農學家，工程師等勞心之「農工」也。亦不僅農工是勞力者，亦有勞力之「士」，科學家大都須觀察，實驗，探險以求知，亦可謂勞力之「士」也。不過就整個勞心勞力之同一人言，他的知識之值，貴於他的勞力之值，他時知識之獲得，應是他的勞力之行動罷了。

(三)由人類文明進化之階段以證知難行易

在知行總論一章中，中山先生對知難行易說又提出一個新的證明。他將人類文明進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這三個階段，可以說是後來漸上，愈來愈進步，由簡樸繁，由易難。就個人求知而言，就人類的進步言，都顯然是由行易而進於知難。由打破知識的難關，故事半功倍之效，可更進而趨於行易約知難。

第一階段，只是不識不知，但本能而生活，適應而動作，並未透過知識的觀察，抵行易階段。在這個時期，人與禽獸長蟲並無區別。皆是有行而不知，或不知而行。第二階段，則是由行而得知識，由生活中得學問，由經驗中得教訓。這只是人類特有的功能，而禽獸則永遠陷於不知而行的黑暗中，無法突破行而後知的難關。行而後知，不僅是人與禽獸分界的標顯，而且足劃分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的界限。先知先覺者，能自得師，能由行中體會出知與學問來，而後知後覺者，每每不能「行而後知」，只能勉強做到「教而後知」或「學而後知」的程度。第三階段，乃是有先知先覺的創造發明和設計後，積累成知識學問，由教育的普及，學問的傳播，宣傳的推廣，領袖人才的指導推動，然後產生大規模的物質的建設，社會的事業，羣衆的運動。故前一階段，由行而進於知難，只是少數天才的創造，而這一階段則由少數天才突破知難的難關後，多數的人均可受知識的指導，而發露實際的行爲。所以這第三階段，乃是科學發明與社會事業發展的偉大時期。實人類文明進步最高的時期。

我個人覺得中山先生這種根據知識發展的歷程，以劃分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段，莫之孔德根據科學發展的歷程，以劃分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段，反而更爲簡單明瞭，平實無欺，富於提倡科學的教訓。孔德分人類文明進化為神學時期，立學時期，實證時期三階段。第一，必須知他所謂「神學」中立學「和」實證」的特殊意義後，方可了解他對於文明進步的看法。沒有中山先生的說法那樣簡單明瞭！只消知道知與行的普通意義，便可明白人類文明進化的階段了。第二，孔德的說法有一種易於被誤解而產生的流弊，就是缺乏文化常識之人，一耳食孔德之說，便以爲一到了，實證的科學時期，宗教將會消滅，科學將被代替，廣大的科學立學將會根本絕跡了。一般「知半解」的人，以爲無孔德的說法，更提倡第三時期的實證科學，就非根本反對哲學與宗教不可。殊不知此並非孔德之原意，孔德亦自創實證哲學，自創入道宗教。足見彼並根本不反對哲學與宗教。而中山先生的說法，却平實而無孔德之流弊。以爲決不會有人根據知而後行之時期，以根本不推測前兩期之不知而行，及行而後知者。中山先生的三時期，不惟不相反對，且可互補而有之，並行不悖，譬如，當我們達到知而後行，根據科學知識和科學設計以

指導行爲建設事業的第三時期的時候，我們爲需要所迫，亦未嘗不可根據信仰，作不知而行的冒險行爲。爲節省腦力，聽其自然計，亦未嘗不可聽其自然而後知。反之，我們愈認識科學的價值，愈明瞭知而後行之重要。我們愈有不知而行的冒險精神，及行以求知而學習精神。所以我覺得中山先生的說法，注重知，而愈所以鼓勵行，提倡科學，却並不反對宗教信仰和哲學理論，較之孔德的說法實爲平實無病。只是沒有像孔德那樣爲戶冊書加以系統發揮罷了。

(四)由人類之分工以證知難行易

緊接着上面的論證，中山先生又將人分爲三類，他叫做三系，指出知難而行易。他所謂三系的人如下：一，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二，後知後覺者爲做效推行；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架成。後一系的人數較前一系的人數爲多，足見其工作較前一系的人爲易。第一系的人爲發明家，第二系的人爲宣傳家，均以列入知者一類，第三系的人爲實行家或行者。顯然實行家的人數遠多於知者的人數，故足見行遠較知爲易。知遠較行爲難。亦即先生不知不覺之行爲易，有先知先覺之知識難。這可以說是明白無疑的一個論證。

不過，有一點須得解釋的：他將人分爲三系，乃注重在三種人的分工與合作，並不是以知識的多少先後而分等級，如所謂知者階級與行者階級的劃分。反之，他認爲事實上實在有這三種階級才力不平等的人，他的民權主義的提出，也就有促使這三種人分工合作，並補救這三種人間的不平等，以達到真正平等的目的。他說「有此三系人相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又謂：「這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然後人類的文明進步，才能夠一日千里」。這是說三種人合作的好處。至於如何補救這三種人的不平等，以達到真正平等理想，他認爲除在政治方面主張民權革命，以「平人事之不平等」外，更須提倡服務的道德觀念：「要調和三種的人，使之平等，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的聰明才

力有三種不平等，而人類由於服務的程度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此外中山先生的說法，尙有須得補充的小困難，我們也不妨在此處，明白提出。他說凡不知不覺的都是「實行家」，意思是說「不知而行」的「實行家」言，本無不可。但不知不覺的人，最容易陷於冥行，妄爲，蠢動，如何能作革命和建國的實行家？中山先生的本意當是說，不知不覺的人一經加以教育，指導，宣傳，組織後，便成爲極有力量的實行家。但不知不覺的人已既而接受宣傳，受過教育，有了組織，這還須知先覺的領袖的指導，則必已既而成爲後知後覺的人了。所以說，不知不覺的大衆，是須得加以訓練組織，宣傳指導，使成爲實行革命的基本力量。這裏仍可採納。蔣先生對於行與動的重要區別來加以補充。行是有目的，有方法，而言之，有理智指導的動作。動是無目的無方法的機械運動。不知不覺的人，只能「動」，而不得稱爲「行」。只能作些愚昧慣性的盲動妄動者，不能作有目的有方法，以參加革命和建國大衆的實行家。

中山先生自己亦復根據沈痛的經驗，說過：「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母乃當時他人之知識太低耶？予不禁爲之心灰意冷矣！」足見阻礙他的革命方略的實行，使他心灰意冷的人，就是當時那些不知不覺的黨人。更足見，不知不覺的人，不惟不是實行家，而且是實行遠大方略最大的障礙。不知不覺者不一定指目不識丁之平民。而指知得覺的人，每每浮動妄，有時反自先知先覺者自命，其誤事破壞的不知不覺之人尤甚。而且中國今後建國的巨大困難，就是在於不知不覺的人太多。中國對日抗戰之所以有勝利的把握，就是因爲國民的教育已比較普及，智識水準亦較前增高，三民主義時深入人心，民族意識已漸漸覺醒。換言之，因爲由不知不覺轉變爲接受主義，服從領袖的後知後覺的人已大大地增多了。並且不惟後知後覺的人，方面稱爲實行家，而且事實上亦有很多先知先覺的實行家。有許多卓著功勳的大政治家，革命時，不僅實行方面有偉大的功勳，而且知識方面每每有過人之卓識，故亦可稱之爲先知先覺的實行家。譬如，孫中山，吳起，戚繼光等可算是軍事學的先知先覺者，但他們同時又是能帶兵作戰，且卓著戰績的實行家。今謂先知先覺者僅知哲學，理論家，理想家，而不知不覺者爲行

者，實行家。似乎不無輕視實行家，抹煞先知先覺的實行家之嫌疑。不過，這一點不足爲中山先生病。因爲照知行易的說法，知雖主，行應從。知應是根本，行應是表現。任何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實行方面的事功，都可以認爲是他們知識方面的學問與識見之表現，他們實行上的豐功偉績，都可以說是他們知識上的先知先覺的附產。所以凡是先知先覺的實行家，仍不妨以標出他們的識見之過人處，而取稱之爲先知先覺者。故中山先生明說，似並不否認有先知先覺的實行家，亦無輕視實行家的嫌疑，而且有助勵實行勇氣的用意。

(五) 哲學史的說明

以前四點可以說完全是從事事實與理論的探討以證知難行易。此外中山先生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援引中外古今各哲學家的思想，以印證並贊助他自己的學說，表示這並不是他個人的主觀意見，而乃是許多大哲，已「先得我心之同然」的普遍道理。這一點我們可以稱之爲哲學史的證明。在中國先哲中，他援引了孔子孟子的話以印證他的說法。我近來並且發現程子朱子亦是堅決主張知難行易說者，均已於上篇討論知難行易可以適用於道德方面時，加以引用發揮，茲不重述。在當代西洋哲學家中，中山先生曾援及奧杜威的談話，以資印證，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徵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爲知耳，未聞行之爲知也。』」杜威這句語確是代表他自己的看法的真話。後來於一九二九年，他曾刊行了一巨冊重要著作，書名雖叫做「確定的尋求」，而內容乃是討論知行問題的。他又給這書一個副題目叫做「一篇關於理論與行爲合一的論文」。他這書的大旨是說，求知識的確定，精神的安定，乃人類普遍的要求。但確定或安定須往實際的行爲中尋求，不可向抽象的理論中尋求。換言之，須於動的生活求安定，不可於靜的沉思中求安定。返觀西洋全部哲學史，他憤嘆於無論古代哲學家也好，近代哲學家也好，經驗派的哲學家也好，理性派的哲學家也好，他們的學派儘管不同，但是他們有一共同之點，就是他們都重知行，貴理論與實踐。這無異於說，杜威認爲西洋哲學史上各派的哲學家，都共同持知難行易之說。不過，他即並不十分贊成這種看法，他

認為這是西洋哲學家——也可以說一切哲學家的通病，他要站在實驗主義的立場，加以校正。他認為這些哲學家只求知關於知識之中，而不知知識於行為之中。他指出他對於科學知識的性質的新認識，就是科學知識，不是從靜觀或冥想得來的，而是從動作，行動，或實驗得來的。他贊成一種知識上的「手術術」，這就是說，我們每得到一種知識，或形成一個觀念，都是經過許多動手動足的一「手術」或行為方始達到的。在某意義下，他實在包含有「蔣先生所說「不行不能知的意思」，不過蔣先生是就事功方面說的成份多，杜威是就科學知識方面說的成份多。所以，杜威並不根本反對知識行易說，也並非不重知識或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行為，不可脫節了。所以他的思想亦歸結到知行合一論。不過他的知行合一論，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恰好相反對；王陽明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杜威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也這兩說各有其是處，各有其特

中國民族文化之改造

中國民族文化之改造的途徑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文化，在如何可以維持民族的生存。過去我國文化過於偏重家族本位。今後文化建設的重心，應該放在整個民族的生存方面。在現在國際團體相鬥爭的世界裏，祇有各民族間的國家組織最為重要。人類的社會生活，久已由國家，部落，民族而進入於國際組織的階段。國家生活形成了人類社會最首要的單位。在共同生活與集團鬥爭的目的之下，必須把整個的民族，統一在國家理想的範圍之內。一切文化思想皆須以國家民族的生存存為前提。進化的標準也必須建設在國家的基礎之上，如此方免於自然淘汰而墮成亡國滅種的慘劇。中國民族的構成，在血統上已經將歷史上各種族混合而為一個民族，更以長久共同生活的傳統精神為基礎，而形成今日中華民族的文化。但是我國過去文化思想的傾向，趨重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缺乏國家的觀念，換句話說，過去中國人的團結力，祇能及于宗族而止，遠未

殊有價值的教訓。不過，從理論根究起來，我總覺得王陽明的學說較精深，而杜威的說法，稍失之表面。我在「知行合一論」一文中，對此點曾略作討論，此處不欲多插入題外的話了。回到歷史證明的本題，杜威不僅本人贊成中山先生之說，契合蔣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論，而且告訴我們西洋歷史上各派的哲學家，皆共同贊成知難行易之說。我們知道，蘇格拉底，首先提出著名的「道德即是知識」之說，意謂道德基於知識，知難是構成德行的先決條件。論者多謂「理論是行的祕訣」一語，最足以表示希臘人重知的精神。所謂「理論是行的祕訣」，意思就是從理論的貫通裏，去求行為的動力。只要從學術的探討裏，去求征服自然指導人生的偉績。也就是認為，偉大的事功，出於偉大的智慧；善良的行為，出於正確的智慧。這種認知行從知難行行亦即認知難行易的傳統思想，一直支配全部哲學史，甚至衍成重知輕行的偏蔽，到了杜威等人方稍加校正。

楊幼炯

能擴大到民族。這種家族本位主義支配了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思想，國家的學說，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儒家思想之全部出發點，乃由其基本的倫理觀念而產生，其本根乃導源於我民族倫理與政治結合之習性而來。自國自始即是政治與倫理相結合，倫理常為政治的原動力。儒家學說而不可，皆以此為中心。影響所及，使我國民族主義與君主政體成了互相依賴而不可離之勢。戰國時代，老莊一派道家，是站在絕對的個人主義的立場與儒學對峙。魏晉六朝時代又有何晏，王弼，劉劭，王衍等一派清談的玄學家，鼓吹個人主義的生活與理想，卒以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而上的。所以中國全部的思想史，雖是道家的個人主義與儒家的家族主義相辯論，但家族主義始終是中國思想的原動力。這種家族的傳統主義壓抑個性，不認自由發展，文化乃歷久停滯不前。直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歐個人主義的潮流從

入中國，於是家族的傳統逐漸動搖。現在的中國，正是個人主義的文化思想與固有的家族主義思想相混雜的時代，以致在今日中國的社會中，發生種種混雜的現象。有的固守傳統，家族觀念，事事保守，有的又迷信西洋文化，祇重個人享樂，事事趨新，這種矛盾的現象，現在正充斥於我國今日的社會中，我們應及時加以糾正。

作者以為中國固有的家族觀念之弊病在保守，而新式的個人主義又太盲從，此二者都是民族觀念缺乏的現象。總理在民族主義講演中力言中國家族主義的弊害，主張擴大到國族主義；同時對於個人主義也加以否認。總理謂「民生」不以個人的生存為限，乃是把衆人的生存，作為整個的對象看待。這樣的民生史觀是以社會的衆人生存為重心，因為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所謂個人，所謂個人的生存，完全是毫無意義的說話。個人既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家族也不能離開國家而存在，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們今日的文化建設以國族的生存為重心；一方面要擴大家族的觀念，到國族的團結；他方面又要剝除個人自由的見解，一切個人思想，道德，都要置重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範圍之內。

五、儒家學說的新價值

我們從現代的立場，對儒家學說的傳統應加以重新估價。儒家學說是中國民族性最好的說明。我們在今日應特別注意孔子「攘夷」的主張，提倡保衛家邦的精神，開揚儒家剛尚義特立獨行的修養，以莫立復興民族之精神基礎。所謂正明道的大辨，難夷與之大防，正是孔子最大成就，而二千餘年來我民族生命的延續與光大，全由於此實貴的教訓之深入民心，而發生偉大的一力量。所以延魯與齊不殺，精誠與誠，乃儒家所具有的情懷，由儒家而推及揚，遂成爲中國民族不可不守之精神傳統。因此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學說是我中國民族精神的說明者。此種固有的民族精神，乃爲我民族建國的瑰寶。我民族數千年來的生命，亦賴此以繼續不墜。儒家提倡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精神，在「儒行論」中，尤有充分的表現。如：「儒有泰之以財財，濫之以惠好，見利不虧其義。規之以衆，道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見其畏。」「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隘危，則居竟信其志，猶恐不忘百姓之病也。」這

種毅然的精神，正是我民族性精華之所在，決不能與一般庸懦退縮的舊儒相提并論。今日處吾國空前迷途國新機運之際，對於儒家學說應加以新的認識，以發揚我民族所特有的精神。

六、從動變中建設中國新文化

總括言之，今後中國的文化，應從動變中建造時代的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的文化建設，應該由外來文化的刺激與民族的轉徙，由動而變，企求加大發展，以適合我民族的生存。本來宇宙間的一切事物，絕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新陳代謝，以延續民族新生命；他方面又要向上發展，使文化在自新的作用中，不斷的進化。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從動中以求進化，則民族生命所生的新陳代謝的機能就要失掉，向上發展的衝動，也就會歸于澆滅，而一個民族自保自衛的能力，根本上就無從實現，結果整個的民族生命，就要歸于喪亡。總理教我們發揚光大固有的文化，對於近代西洋文明，則主張迎頭趕上去。總說：「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可從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現在我們知道了眼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可見總理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基本態度，是主張保存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要剔棄，而且要現代化，建設科學的文化，要迎頭趕上西洋的文化。中國今日的文化，仍是逗留於農業社會時代，而西洋文化則已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頂點，這完全是時代進化的生產方法的不同。我們現在在建設國難過程中，產業的發展，務求適合現代國家的需要，因之文化也要加大發展，實行科學的文化運動，展開新時代的新文化的建設工作。

本來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夠發揚光大，其間必經過過多次的文化接觸與刺激。歐洲在中世紀的文化，東傳個性，致無從發展，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思想自由運動始打破傳統而家以政治上的束縛，發揮個性的自由，於是歐洲文化的進步，乃有一日千里之勢。我國周秦時代的文化，並不下於希臘文化者，乃是出於殷的文化，影響到周的文化，而周的文化，又影響於秦的文化。因殷周兩文化接觸，乃產生種種的新文化。可見文化的發揚與光大，全在與外來接觸及內部環境的變化，而誘致其發展。我國近代文化之發展，始於

西方文化東漸。自鴉片戰爭以來，百年之間東西文化之接觸，使中國文化成
新舊並存的現象。因七十年來我們的學者對於文化的努力，祇知模倣，不重
創造，結果在今日的我國文化方面，雖有動而少變，中國文化依舊在停滯的
狀態之中。但我們生逢這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偉大的動盪時代，我們的文化又
正在錯綜複雜的變化過程中，我們應如何通古今文化之特徵，加以保存而發

如何平抑物價

吳幹

平抑物價，早為抗戰國策，然如何平抑物價問題，至今尚屬論紛，
莫衷一是。當此物價暴漲，人心不安之秋，對此問題，實有詳加討論之必要。
一般人認為平抑物價，必須壓低物價，不然，則平抑物價之一切努力，皆
屬徒勞。此乃十分錯誤之見解，有加以解釋與糾正之必要。物價上漲，非絕
對有害；反之，適可刺激繁榮，象徵繁榮。物價上漲，非平時絕無而僅為戰
時所有之現象，殊不必於平日歡迎之不暇，一至戰時則對之反惶惶若不可終
日。蓋物價上漲，為戰時貨幣政策下必然之結果，既不可避免，亦無需避免

。全國人民既承認今日之戰爭乃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戰爭，對一切犧牲
在所不顧，則對此平時常有，而今日又不能避免，且無需避免之物價問題，
又何用其惶惑乎？吾人所應研究者，為物價變動所產生之結果如何。較今日
物價變動所產生之結果為經濟失調，財富重分配，則吾人當知此種現象，絕
非必須伴物價上漲而俱來者。反之，設物價狂跌，亦未嘗不可引起經濟失調，
財富重分配之現象。所不同者，只在受影響者又為另一部份社會之人士耳。
於是可見平抑物價之目的，並不在壓低物價，亦不在固定物價，乃在達成
穩定物價與調節物價之兩項目的。換言之，吾人不能，亦不須排出物價水準
之向上趨勢，只在如何設法一面消滅物價起伏不定之現象，一面維持個別物
價間之平衡關係而已。

所謂平抑物價必須穩定物價者，因今日物價之變動，暴起暴落，有如狂
瀾。此種現象，因為投機操縱之後果，然亦為投機操縱之起因。如此因果相
生，推波助瀾，其於經濟機構與人民生活之影響至鉅。譬之米價，設緩緩逐

漸上漲，人民當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有所準備，如所預戒。如不明月而上漲
數倍，則人民又安得不終日惶惶，怨言載道？米價如是，其餘一切物價莫不
如是。故吾人所謂平抑物價在於穩定物價者，固非謂必須壓低物價，亦非謂
不使物價上漲，乃在如何設法使物價緩緩逐漸上漲，而不至有暴起暴落之現
象也。

其次，平抑物價必須調節物價者，因今日物價變動之核心問題，除暴起
暴落之現象外，即物價失調，因而使個別物價之間，無時無刻不喪失其以往
之平衡關係。吾人應知所謂物價者，非專指商品而言。按諸經濟學原理，如
利潤、利息、地租（包括房租、遞增費用等）、工資（包括薪金等），無一
不應視為物價。今吾人若以利潤、利息、地租、工資，以及各種商品物價之
變動，彼此互相比較，當知今日物價無時無刻不喪失其以往之平衡關係。就
一般言，今日物價變動之中，利潤與利息似覺過高，利息薪金則又過低，至於
商品物價，亦各各漲落不一，而同時上漲者，則又上漲之速率各不相等。諸
如此類，皆為消滅物價平衡之因素。若物價上漲，各物價之間，皆能比例
的上漲，則社會表面上之現象略有變更，其實際之經濟關係，必一如往昔，
無若干之牽動。易言之，如物價上漲一倍，社會各個人之所得，亦大約上漲
一倍，（其不及一倍之數，即可認為對抗戰建國之犧牲與貢獻。）是社會各
個人之購買力並未發生若干變動。所不同者，只往昔一元之貨幣，今日必
以二元當之耳。設各個物價之間，並非比例的上漲，甚或漲落不一，則問題
必於此發生，即社會各個人之所得及其購買力將受到不同之影響，結果必

漸上漲，人民當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有所準備，如所預戒。如不明月而上漲
數倍，則人民又安得不終日惶惶，怨言載道？米價如是，其餘一切物價莫不
如是。故吾人所謂平抑物價在於穩定物價者，固非謂必須壓低物價，亦非謂
不使物價上漲，乃在如何設法使物價緩緩逐漸上漲，而不至有暴起暴落之現
象也。

然使經濟失調，財富分配，一面造成新舊資產階級，一面使固定收入無以爲生。

總之，抗戰建國大業必須完成，其大部份之經費亦必取之於通貨膨脹，故物價上漲不可避免，亦無庸避。然爲平均社會對抗戰建國之負擔起見，吾人固不能不平抑物價。至所謂平抑物價者，乃在穩定物價與調節物價而已。

關於平抑物價之方法，應以平抑物價之目的爲依據。是故吾人如欲達成穩定物價之目的，則不可不改善今日之金融政策，調整現時之勞工市場。如欲達成調節物價之目的，則更不可不一面加重稅收，一面改善俸給待遇。至於一般物價之控制與管理，乃以上辦法之補充辦法，固亦應以穩定物價，調節物價爲其最高原則。

物價之控制與管理，已成爲今日之迫切問題。就技術方面言，除調整與健全管制之機構外，如何決定「官價」，實爲平抑物價技術上嚴重而又核心之問題。關於官價之決定，向爲國內外學者聚訟之點，多年未獲圓滿解決之道，吾人萬不可死搬硬套。

但決定官價之最高原則，要不外以「對合理價值與以合理報酬」爲其對象，以穩定物價與調節物價爲其最後之目的。

然則何謂合理價值？又何謂合理報酬？易言之，如何估價，如何決定報酬，方得謂之合理？此誠最不易解決之問題。蓋以商品與商品之間性質不同，來數之情況不同，控制之範圍不同，控制者之人數不同，殊難覓一簡單劃一之辦法，既可施於此，亦可施於彼，無往而不通。我國今日決定「官價」之現行辦法，似爲成本加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之合理利潤，似認成本即合理價值，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之利潤即合理報酬。如此定價之標準，似未充分認識其問題之重要性。

所謂成本，意義極爲含糊。因就一事而論，往日之成本爲成本，現時之成本亦爲成本，不知其係指往日，抑指現時而言。就同類專業論，高效率工廠之成本爲成本，低效率工廠之成本亦爲成本，不知其係指高効率，抑指低效率而言。至於勞動者之人力，與富有者承繼之土地，則又毫無成本可資根據，是又一困難也。再則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之利潤，定爲合理利潤（或

合理報酬），不知何所依據而出此。如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高出一般利潤水準過甚，則此種規定未盡調節物價之功，當不能達成平抑物價之目的。如百分之二十乃至三十低於一般利潤水準過甚，則被決定官價者，勢必退出其事業，結果恐供給減少，物價反而暴漲。是故對於合理價值與以合理報酬（成本與利潤）之問題，尙應從新研究，從新認識，方能得一較合理之辦法。總之，估價之方法甚多。究當使用何種方法，當視各種商品之性質，集散狀況，控制範圍，與控制者之人數而定，要在主持者能於權衡調節之間，得一合理辦法，不至與平抑物價之最高原則相去太遠爲妥當。譬之今有運輸之事業，如發電廠，則應以往日之成本爲估價之根據。交通運輸工具，如木船板車，爲吾人希冀其繼續發展者，則應以現時之成本爲估價之根據。至於有相當多數，然不若農業之普遍散漫，如火藥工廠等，則應以「堆棧成本」（或邊際成本）爲估價之根據。惟有農產品，如粮食等，最難估價，蓋以農產品爲普遍散漫之物，而各地之土質又迥不相同；在此種情況之下，似應以一般物價減除食物價之物價水準爲平抑物價之主要標準。其他如地產之無成本可依據者，則可用「資本化」之方法，以合理所得與合理利潤，求一合理之估價。一言以蔽之，估價之方法均可互相參照，總須期其能達成穩定物價，調節物價之目的。

至於合理報酬（或合理利潤）仍不應與一般利潤水準相去太遠。否則，過高過低，不特使一種商品之供需失調，造成其價格暴漲暴落之現象，且可影響其他商品之供需情況，使一般物價喪失其以往之平衡關係。所謂一般利潤水準者，乃隨各時各地而異，政府似應有詳細之調查。至於規定合理報酬時，自可按各時各地之供需情況，與以相當之折減，以寓鼓勵與制裁之意，庶乎不至因平抑物價引起不良之後果。

至於平抑物價之步驟，論者有主張以平抑物價應「由部份統制達到全部統制」者，又有主張應「由平抑物價以平抑工價，由平抑工價以平抑一般物價」者。但吾人以爲不如：

- (甲) 以部份統制爲原則，至萬不得已時，則全部統制；
- (乙) 先平抑生活必需品物價，然後平抑工價，如有需要，再平抑其他物價。

解決今日之糧食問題方案中，有謂應以都市之部份計口購糧辦法，以逐漸擴及於全市，然後及於全社會者。亦有謂我國人口無統計，糧食產量無統計，不可冒昧採行「計口授糧」之辦法者。此皆片面之見解，似終非對症下藥之良法。吾人以為我國對於人口糧食固無精確之統計，可作計劃統計之資，如欲全社會推行計口購糧辦法，非但困難，且無把握。曠是之故，吾人以爲平抑糧價，應以部份統制爲原則，至萬不得已時，則全部統制。

其次，糧食雖爲生活必需品中之最重要者，然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油、鹽、燃料、住宅等物價之漲落，影響人民之生活亦至鉅。經濟學中所謂「生活水準」，係指一切生活必需品之必需數量而言，而一般工資，至低亦須使其能維持此「生活水準」。故「生活水準」可視之爲決定工資之最低標準。至於糧食，不過其中之一部份而已。因之，吾人以爲平抑物價，宜先平抑一切生活必需品物價，然後平抑工資，當可事半功倍。

最後，吾人必須論及，即今日社會所最關心最注目之俸給問題。若薪給可視爲物價之一，則今日之一般薪給，實屬物價失調中之尤者。一般物價尚漲廿倍，而薪給則增加無幾，結果，以薪給爲生者，比之社會其他各界，對於抗戰在國之貢獻犧牲，勢必過甚。時至今日，一般教育界與公務人員，其生活水準可謂低至無可再低之境界，甚且生活上更有窮生問題者。吾人爰煩：生活標準之抬高易，而生活標準之降低難，此尤以中產階級其中產階級之生活標準爲然。蓋以中產階級多以富於思想之士大夫階級所構成，此等人

正因其富於思想，故或不願犧牲於日常生活所必需，尤不願犧牲其子女之培養與教育。故其痛苦焦灼之狀亦甚烈。

欲改善一般教育界與公務人員之生活，自實有其困難之處。蓋以立於抗戰前線之士兵，其生活之困苦，尤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但吾人如以徵兵之制度而論，似亦有可解釋之餘地。人民之因徵兵而服兵役，則其服役乃純係義務性質。至於一般教育界與公務人員之服務社會，雖亦爲義務，但不無含有相當之職業意味。總之社會如有不平之現象發生，政府爲安定人心計似有急謀改善之必要。

論者有謂，改善薪給勢必加重發行，徒使通貨膨脹更加深刻化，薪給之購買力再度下降，如是循環發展，非僅不能解決薪給問題，反有造成通貨膨脹之虞者。然此種困難，以吾人視之，實可以避兔，平抑物價及調節物價即其避兔之道。今日因抗戰而膨脹通貨，因膨脹通貨而物價失調，因物價失調而造成財富重分配之現象，使獲得過分利得者足以暴富，而以薪給爲生者則生活日艱，是利涸而薪給之間，有加以平抑調節之必要。況戰時暴利，多係不勞而獲，正增加財政來源及調節薪給待遇之最好對象。我們政府如欲實行其傳統之社會經濟政策，即應增加稅收。所謂增加稅收者，即於正當預算之外，追加若干成，以爲改善薪給之財政來源。如是，不特物價得以調節穩定，拉戰之負擔亦可因而公允平均。

青年論壇

力行哲學與心理建設

袁月樓

總理謂「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所謂「以他認爲「革命必先革命心」，這就是說心理爲一切行動的主宰，心理建設實爲革命事業的前提。我們

要革命，必須使每個人有勇敢犧牲的決心，使全民族行動的主宰，心理建設實爲革命事業的前提。我們不是靜止的；其活動的結果，不僅是理想，而且是生產力量的根源。它能支配行動，同時自己又在行動中表現出來。這就是總理爲什麼提倡「知行

易一說和 總裁提倡「力行哲學」的原因。力行哲學是行易知難學說的發揚，行易知難學說又是 總理繼承孔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心傳，是以習仁勇的偉大民族心理作用，發揚忠孝仁義禮義和平日民族道德，合此心理作用與道德的實踐而爲奮鬥的民族精神。所以恢復民族精神，即是三民主義革命的重要手段，而心理建設又爲恢復民族精神之實行辦法。總裁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實施，都是心理建設的具體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實施，都是心理建設的具體

長安縣南十里，這三個王國合起來稱三秦，是用來欺騙劉邦的。劉邦所封的地方，是離關以東的關西，加上四川，都按指定在漢水上流的新鄭，稱爲漢王，本來約趙王趙歇改封爲代王，關西的地方另封給張耳，稱爲山王。本來的齊王田布改封爲魯東王，齊國大部分地方另封給田都，稱齊王，齊國舊有領域的北郭封給齊國的宗室田安，稱齊北王，總稱三齊。本來約燕王韓廣，改封爲遼東王，把燕國的地方改封給臧荼。魏王魏豹，則封爲西魏王，都于平陽（臨汾）。韓王韓成本爲項羽的叔父項梁所立，未曾更動，但暫時不許就國，最勇敢而得力的英布封爲九江王，都于鄒，即今之六安。百越的酋長吳芮封爲衡山王，都于邾，即今之湖南湘潭之株州。楚懷王的柱國共敖，攻克南郡，封爲臨江王，都于江陵，魏國的將軍司馬卬，平定河內，封爲殷王，都于安陽，張耳的妻臣中陽，首先替項羽攻下三川郡，封爲河南王，都于滎陽，以上，共十八個國王。楚懷王應該升階，改稱義帝，項羽自身是事實上的皇帝，爲表承認，自封爲西楚霸王，都于彭城即徐州。這樣一副封建的陣容，在他以爲安插妥當了，而在事實上，到處都埋下了亂苗，到處都伏着危機。隨便舉一兩件事做證明：各國的將軍，凡是跟隨他入關的都封爲本國的國王，使得原有的國王都要遷徙到較苦的地域，這就是亂苗。陳餘是張耳的仇人，張耳一旦爲常山王，陳餘便一日要設法推翻張耳，不惜與項羽爲敵，陳餘自己的力量也許很小，加上田榮，這個事實上的齊國領袖，而不會受尺寸之封，便足以撥亂項羽的牛頭天下；何況軍中一個隨從不統統一天下則劉邦的...

劉邦的軍事力量當然不及項羽，項羽擁有四十萬人的兵力，劉邦則只有三萬，但劉邦能善用不利於項羽的各種環境，而實施建築在戰略上面而戰略，利用田榮革命，趙王歇革命，陳餘、彭越等紛紛起來反抗項羽的絕好機會，利用項羽本身的最大弱點如殺殺義帝等事。劉邦聚集了五個諸侯的兵共五十六萬人，會師滎陽爲義帝發喪，申討項羽，一舉而陷彭城。但項羽究竟驍勇，劉邦擁有五十六萬，他只帶了三萬名騎兵，以絕對值得贊美的戰略，兩出胡陵蕭縣繞道彭城西面西南二方，爲迂迴包圍戰。以早到先打，殺了漢卒十餘萬人。漢軍不死于泗水，都被追擊而死于靈壁之東而睢水之上，睢水爲之不流。漢王劉邦本人也陷在三重包圍中，僥倖藉大風脫逃。狼狽不堪，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彭城之戰。

在楚漢相持的三年中，劉邦之所以形勢較佳，也是由于有政治上，戰略上重要的因素。劉邦彭城突圍，狼狽西奔的時候，梁陽的守軍雖多，未必能抵抗項羽的主力，還是依靠辯士隨何勸走了九江王英布，突然在安徽西南，表示背楚附漢，才能牽制了大量的楚軍。在後方，爲安定民心，於是立刻封爲太子（即後來的漢惠帝），太子與隨何留守機關，他知道必須用人，他能夠用人，隨時都吸收新的人。

劉邦與政與軍國大事都已成議，制法令，立官制，築城邑，計戶口，以及彈漕運。諸事俱備。能於事先表明劉邦的，先發後行，時間上不完勝於秦的，就由這何先行後發，前後方，保持了絕對的合上。後方鎮守的關，行政效率的提高，保證了前方的勝利。

在敵人的後方，劉邦又發了遊擊工作。除漢漢兵去增大九江的聲勢外，又利用魏野澤（即有名同梁山泊）的水寇彭越竭力破壞城與秦陽之間的交通與運輸，他的花樣更多：當梁陽被困他自己當護國的一天夜裏，他命令紀信偽裝自己，夾在二千名女子之中，出東門詐降，引起了楚軍大家一齊聚集東門來觀看女子，他就帶了十個騎兵，西門遁去，回到函谷關內，徵調新兵，重整旗鼓，終究兩軍訂定鴻溝爲界，保持平衡的局面。鴻溝就是今日的賈得河。

提起「鴻溝協定」，使我們想到「鴻門宴」。那時項羽按當雷鈞的威力，親率四十萬大軍，長驅直入，駐馬戲亭之西的鴻門（隨遷滎東），威脅咸陽，劉邦已從咸陽逃往于今日蒲橋的霸上。項羽準備了一天的時間，發覺劉邦的十萬人，就在那一天早晨，劉邦却親率漢門謝罪，年少英勇的項羽（那時還不過二十五歲）立刻以盛大的宴會，招待一個成功的戰友。項羽的偉大固值得我們的敬佩，而劉邦的戰略，他的毅力，他的肯幹，捨得幹，幹到底的精神，就是何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二是「人」的力量爲控制一切「事」的力量。在

他不知道必須用人，他能夠用人，隨時都吸收新的人。

他不知道必須用人，他能夠用人，隨時都吸收新的人。

他不知道必須用人，他能夠用人，隨時都吸收新的人。

才。因此，他養成了自己的優良幹部。當他起要補的時候，跟隨他的只是若干最下層的平民與最低級的官吏。樊噲是一個屠戶，夏侯嬰是一個馬車夫，周勃是一個以織薄而為生，常為人吹簫的喪事員，而他自己也是補鑲的刀筆吏。曹參是沛縣監獄的看守員，而他也是一個沛縣的泗水亭長，位置相當于今日的縣保主任。他這一個革命集團，也不過是一種小規模的流寇活動。直到他向西略地，開始入關破秦的壯舉，除原有的幹部外，陸續吸收了許多人才，才完成了他的楚國大業。

在入關的過程中，在高陽，首先遇到了一個當地的文人鄭敖，勸他注意糧食，舉取秦廷有儲所存的陳留。劉邦依計而行，聲勢果然大振。鄭敖其的弟弟酈商，也率領了他所糾合的數千人；來參加劉邦的隊伍。在攻破許昌附近的滎陽，已進入了韓國的舊壤。韓國的志士張良，他小時就有一段有名的「圯橋納履」的故事，那圯上老人際定他將來是一個大才，他曾經在留滎道過沛公（即劉邦）這時隨了韓王成，以共兵一千餘人的部隊，正在為流寇式的游擊戰爭，以報國仇；這一支部隊，自己成事不足，輔助別人為大規模的正規軍的籌備式尖兵，力量是很大的。酈商藉了韓兵的籌備張良的計劃，到沛縣經過，進入軋轅關（據師東南）不經亢牢，而直達洛陽。破關後到滎水而西北，直達商鞅，沿途遇到了威感與劉邦的老友至陳，就請他們助攻西陵胡地，又有督督吳高的別將梅梅，幫助取得了軋轅（內鄉東北）與折縣（內鄉西北）。兵到武關，趙高已殺二世派人來請劉邦依照張良的計策，不理軋轅而直攻對武關的守將陝，這陝守將都

是屠戶商人之子，一被劉邦收買，同時殺下五萬人的糧運，多張旗幟在這樣威利誘之下，佔領了武關。在藍田，又大破秦軍，到咸陽，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來投降，於是劉邦達到了先入關的目的，而項羽落後了。

但是最要緊的成功因素，是係于一個韓信。韓信，尤其是所謂「謀臣」，即謀略家。韓信，即周勃，有勇名「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即劉邦成功的關鍵。韓信，曾為項羽與項羽的部下，位置甚低，沒有什麼表現；在劉邦被迫離開咸陽南赴漢中的時候，韓信泡了一種激發，跟隨漢王，但依然位置甚低，充當一名逃散（副官），依然沒有什麼表現，他的本領，只有趙何知道，當劉邦只剩三萬兵，一般士兵與軍官都感覺劉邦已經沒有前途，在子午谷的路上開始紛紛逃走，韓信便是其中之一人，劉邦那裏注意這一位小小的副官呢？還是趙何着急了，就跟着拚命向趙，好容易追回來了。由于趙何的保薦，立刻築壇，拜韓信為大將。韓信報効知己消滅項羽的辦法，即乘項羽種了亂苗無暇西顧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第一步擊破三秦，第二步出函谷關，直逼彭城，開始了楚漢的爭霸戰。項羽在彭城之戰的明日，也利用了西魏王魏豹拒絕了黃河與漢口，阻隔了劉邦的水運運輸，韓信便一面築疑兵，一面突襲，殺魏豹一舉佔領安邑，俘虜魏豹，平定了西魏之後，又在關東新殺魏餘大將復說；因張耳表請劉邦，韓信是反對張耳的，死對頭，故韓信超生歌的軍隊反漢。韓信即由趙子，東出并壁，與陳餘正式交戰，先作詐敗，敗逃

到預先佈置于魏水河邊的一萬人的營中，就突然

作堅強的抵抗；同時，在當天的黎明之前，已派派出二千人埋伏于趙軍營壘附近的山上，在這時都走下山來，襲破趙軍的官營，拔去陳餘的軍旗，插上漢軍的旗幟。陳餘及其部下，向前不能擊破韓信的水上軍，退後又回不到自己的營壘，軍心大亂，陳餘被斬于泜水之上，趙王敗成爲俘虜。漢軍破趙是軍事成功一關鍵，聲勢恢復了東彭城時的浩大。

接着不久，韓信又立了一次泜水之戰的大功。事實是這樣：韓信破齊，項羽派大將龍且接濟，龍且與韓信夾泜水而陣，龍且在水東，韓信在水西。交戰的前後，韓信令人用一萬包沙袋，塞住泜水向上流。交戰開始，韓信引兵渡河，佯作敗退，退到沙袋，龍且引兵追擊，半渡，韓信下令掘去上流的沙袋，龍且被殺，韓信被封爲齊王，這樣，劉邦實在靠着韓信奠定了楚漢相持的局面。

決戰的時期已經來臨，項羽這才知道一個韓信關係之重大。劉邦的優勢，是齊那智勇兼備的。一舉而下魏趙燕齊，毫無不勝，威震山西，河北，山東，據有齊國，實爲整個北方而韓信的擁護，項羽又何曾料到，這位北方勇將至水久不能從西楚霸王特派的那些騎士武涉洩露等而遊說，劉邦不願意與楚漢三分天下，韓信在鴻溝議定而明日，永久不顧一切而違反了條約，這舉項羽東向的大軍，同時通知韓信，彭越，英布才會相繼圍攻，淮陽關西北，火擊項羽，項羽憤怒極了，立即轉頭，打劉邦，這時韓信彭越英布二條未到，劉邦一戰大敗，退固死守，若新張良出計，楚快通知韓信等，說他以擴大的地盤，果彭越計斃了，英布若肯歸韓信

進抵亳州；彭越佔領了商邱，徐州聯絡已被截斷，韓信統率二十萬大軍，來與彭越會合，商邱與亳州的之間，已經不允許項羽通過，在壽縣與亳州之間，比較尚有突破可能。項羽就選擇了十萬人，由淮陽向正東衝，來到壽縣縣東南的垓下。

啊！垓下，這是何等悲壯的千古不朽的地名，畫世英雄項羽就斷送在這垓下！垓下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將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聲何等慷慨！

項羽是怎樣解決的？也就是由于這一個韓信。韓信以相同于希臘人在馬拉松的兩翼包抄的戰術，設誘了項羽。韓信以三十萬大軍居中，孔將軍居左，雲將軍居右，劉邦督後，韓信詐敗，楚軍深入，孔雲兩軍同時兩翼展開，楚軍陷入重圍，全部殲滅。項羽只剩八百餘人，連夜潰圍，南北馳奔，到了天明漢軍才知消息，派了千騎兵去追。項羽走到淮河，只剩下百餘人，渡淮以後，閉路于晨夫，晨夫所歎，陷入大澤，為漢兵追及，又突圍向東，到了東城（從壽縣東南），所餘僅二十八騎，這二十八騎兵到了最後，他仍能分為四隊，施演驚人的戰術，四隊同時突圍，指定對面三個山嶽，為三個集合地點，一聲令下，分向四面馳去，便有漢將一名為項羽所殺，片刻之間項羽的騎兵又集合于三個山嶽之上，漢軍不能確知項羽的實在，等到漢軍分而為三，把三處的楚騎兵分別圍困，項羽又再度衝出，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二十八騎之中，只損失兩騎。項羽又帶了這二十六騎，又繼續向東南奔逃，來到長江的江岸，和縣東北的烏江渡渡口，烏江的亭長向他說：「江東雖小，但也有千

里的地方，也可以稱王，偏安一方，你若是願意，漢王請趕快坐我所預備的船，否則漢軍追兵一到，什麼都來不及了！」項羽聽了非常感慨，自己當年隨同叔父，帶了八千子弟渡江，現在只剩了二十六騎兵回來，太悲慘了！於是高歡以後，別了他一生所最愛的美人名馬，而自刎了！

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楚漢爭霸戰便從此結束，而

荷屬東印度

南惟立

荷印羣島位於亞澳兩大陸之間，共有面積七三三六八二平方哩，居民則為六〇七三二〇二五人，當荷蘭本土七倍。其中土人為五九一四三三五五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七；歐人二四二二七二人，佔百分之四；華僑二二三三八五六八人，佔百分之二；日本人及其他的亞洲人共一一〇二二人。

歐人未東來之前，這些島嶼都是獨立自主的，在文化頗受印度的影響，但政治上則多為中國的屬邦。自十六世紀歐人東漸之後，葡萄牙人首先到達了那地方。繼則荷蘭人因被擠斥於歐洲各海口之外，也積極的向東發展。一六〇二年，荷蘭以爪哇為根據地，成立了東印度公司，由政府予該公司專利經營航業商業之權，并可代表政府與土人以及官吏訂立契約，使其控制全境的經濟。及一七九八年，政府將這種特權從東印公司手中收回，直接委任總督，兼海陸軍總司令，管轄荷印全境。從此以後，這些島嶼便成了荷蘭的殖民地。

荷印各島以爪哇的交通最為稱方便。鐵路有二幹線，一線成東西行，聯絡巴達維亞，三寶壟與泗水等城市。二幹線之間，有南北行之膠濟線多條。海外航線以巴達維亞，泗水為中心。巴達維亞為一轉口貿易港，商業之繁榮，僅次於新加坡，為荷印之首府，荷蘭遠東艦隊駐此。其東五、六哩之遙，有坦容度路為其補助港，具有新式設備。二者之間有強利及鐵路以相互聯絡。泗水在本島之東北，外有馬都拉島屏障，亦為爪哇重要出口之一，並為荷蘭海軍的根據地。巴達維亞在爪哇之東，自然景色與經濟實業宛若爪哇，故有爪哇之稱。

經濟價值次於爪哇的為蘇門答拉，婆羅洲等島。蘇門答拉則位於馬來半島之旁，隔馬拉甲海峽與馬來半島相鄰。其面積較爪哇大三倍餘，人口則僅及爪哇的百分之八。荷屬婆羅洲有二〇六三一九平方哩的面積，盛產石油，煤，甘蔗，橡樹，咖啡，椰子等。高緯度國家所渴望的橡膠物產，國防用品，藥料，在荷印是豐盛的生產者，幾乎遍地皆是。爪哇

西部山地有豐茂的橡樹林；平原上和乎緩的山坡上。氣壓圖成層層的水田，接連不斷的種植稻和甘蔗。稻米年可三穫，產量雖極豐富，但因為入口的潤滑，仍不足用，尚須仰給於外。某多產於我海一千呎至四千五百呎的山坡而為雨水沖淋的土壤上。咖啡則多產於有乾季，東部山地。此外尚產椰子，香料，和金雞納。礦產則有石油與錫。以上所述之物產在蘇門答拉亦富。歐洲洲主產食品為木料，西米，米，椰子，樹膠，咖啡，香料，椰草等。

荷印茶與咖啡的產量皆居世界第三位，蔗糖年產量可達世界產量百分之八，橡皮的輸出，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馬來亞。石油由荷蘭駐紮石油公司，美國美孚公司，荷印石油公司等開採經營，年產量據一九三七年統計，約為七百萬公噸，僅次於美國。錫之產額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二十七點六，次於馬來亞於玻利維亞而為世界第三位。胡椒產額佔世界百分之八十二，居世界第一。木材中，以麻栗木為其重要的輸出。

在經濟發展上，荷印具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為供應別國之國家需求，竭盡地力，生產着價格低廉的工業原料和農產品。她沒有重要工業的建設，所有的僅是些許輕便工業，依其性質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甘蔗，橡膠，咖啡等簡單的製造工廠，至於礦業方面，為便於輸出，石油，錫等工業設備尚未完備。當尋求其物產的國家經濟狀況景氣的時候，荷印同工業與貿易，但也隨著波動而感不安。另一部分便是製造消費用品的輕工業，

從事生產紡織品，肥皂，皮革等。因為沒有重工業建設，一切生產機器仍須仰賴於外國。就是生產投資，操於外人之手者亦不少。茲將英荷美日四國之投資額及其所佔總額的百分數列如下（單位：千盾）：

國別	農業投資	百分數	礦業投資	百分數
荷	一五三八三〇	七四	三〇九四八二	五〇
英	二七、〇五三	一三	二四二〇〇	二〇
美	五三〇三五	二五	一〇〇〇〇	一八
日	一九六二八	九	一八〇、〇三	一

以一九三八年貿易國別而論，荷印輸入額為四八五萬盾，輸出額為六五九萬盾，荷美美日附佔的數額及其對總額之百分比如下（單位：萬盾）：

國別	輸入額	百分數	輸出額	百分數
荷	一〇六、二二二	二一	二〇、四	二
美	六〇、一一五	八	一三、六	一
英	三八、八〇〇	八	五、三	〇
日	七二、一五〇	二一	三、一	〇

日寇在荷印的投資雖不及英美，但其所賴於荷印的物資供給，則遠過於英美。舉凡石油，橡膠，鐵礦，都是日寇所急需的軍備原料。如果總能佔有荷印這些物資，她便可軍事工業上自足自給，而怕英美的經濟壓迫與封鎖；她便可與英美長期戰爭，而怕戰時經濟的崩潰。所以，自歐戰爆發以來，日寇無日不處心積慮地，想以武力的壓迫，使荷印的資源置於她的控制之下。

去年四月十五日，日外相曾發表聲明謂：荷印同日本在經濟上有密切的關係，日本政府對荷印之維持現狀，深表關心。及荷兩戰敗，政府逃亡英倫

之後，日寇求得之心益切，九月間曾派南相小林赴荷印交涉商務問題，以鑰結果，乃又於十一月底派前外相芳澤涉訪，為期約半年之久，結果，荷印只允讓與供給石油而已。據今年六月十八日電，日內閣情報局代理發言人石井談稱，日本對荷印之經濟關係，自荷政府遷往倫敦，荷印為戰爭目的動員之後，已受嚴重之影響，日本政府不能仍不過問。日本所要求者為：（一）日本參加開發荷印之天然資源；（二）日本移民經營各種事業；（三）日輪將開人封閉之港灣中，以便運載日本企業所產之貨物；（四）海岸線對日輪部分開放；（五）日人得發運礦業；（六）日本參加開發航空及交通。由這五項要求看來，可知日寇對於荷印的資源如何地垂涎，其野心是如何地狂妄了。

所幸者，荷屬羅已淪陷，但荷印政府終以英美的聲援，持以鎮靜的態度，不惟未為日寇的武力壓迫所動搖，而且迅速地加強保護荷印的武力，於必要時不惜以武力抵抗。於是，日寇的野心便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而不敢輕於以武力的威脅來壓迫荷印政府了。

現在太平洋大戰已經發動了。日寇目前以海軍全力進攻馬來半島，以攻佔新加坡為目標，這其間在戰略上所必取的一個攻勢。但其經濟的野心所在，當然仍是荷印的資源；她非佔領了荷印，不認對英美作長期戰。倘若日寇在新加坡得手，恐怕她要立刻進攻荷印。不過，荷印的海陸空軍都有充分的準備，防守之力頗強，如果日寇不能佔領新加坡，恐怕她不敢就隨使開關另一個毫無勝利把握的戰場。

短評

關於「人民公有的工業建設」

最近顧曉波先生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人民公有的工業建設」一文，主張政府開放有利的經營工業交通事業，發行特種股票，由政府保證，以吸引人民投資。這個主張有兩點重大的意義。第一，他想到用這個辦法來籌募建設經費，固非不正常的用途，轉移生產事業。第二，他想到用這個辦法，減少法幣的發行額和流通量，以維持法幣的價值。目前我國的戰時經濟，最根本的便是物資和物價兩個問題。而顧先生的建議恰好是對這兩個問題而發。的確就是「對於戰時經濟政策的一點小意見」，其實意義是十分重大的。不過還有一點補充可見，我們願提出來，就商於國人和願先生。

用「國家經營」，「人民投資」的方式來發展我國的工業，在原則上確是一個一舉兩得的好辦法。英國的「公共托辣斯」便是屬於這個性質。但在今天的中國，採用這種方式，有兩點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國目前的國營事業，主要是以重工業。國家經營這類事業，是為國防和工業化打基礎，原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不過我們却不能因此即主張國營事業只許資本，不許賺錢。現在如果把握利的事業都讓給人民投資，結果勢非弄得國營工廠只能賠錢不止。這種政策不但會使整個的國營事業受到打擊，而且也要加重國家的負擔。這是第一點。我國過去的國營事業都是無算營私的大本營，沒有絲毫的效率，和成績可言。近年新辦的國營廠礦已一洗過去的積弊，但人民對於政府經營企業的信心還沒有十分建立。而事實上少數有利的國營廠礦所獲的盈利，和經商投機比較起來，也實在微乎其微。在這個

客觀形勢下，希望人民自強地購買政府發行的股票，把資本交給政府管理經營，恐怕不會十分踴躍。這是第二點。即（一）這種「人民公有的工業建設」以輕工業為限，重工業仍由政府自行經營。（二）政府發行特種特種股票，應採取強制攤派的辦法，規定商人的利得，要拿出現款投到這種公有的工業方面。

樞機在握時應有的努力

日寇掀起了太平洋大戰，無疑地更加保證了我們抗戰的勝利。可是我們却不能因此而稍存坐待勝利之念，怠弛了我們四年來苦戰鬥的意志。

英美友邦擁護強大的海軍與空軍，雖然有戰勝日寇的絕對把握，但因地理的關係，却都在準備着長期的努力。在這長期戰中，我們當然也須準備個長期的努力，尤其是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

今後，我們既將與英美蘇法友邦並肩作戰，以消滅共同的公敵，則在此反侵略戰爭中，自有我們應盡之使命。我們就着表現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不辱此歷史的使命，就必須隨時準備更英勇的戰鬥。

英美諸友邦雖然擁有消滅日寇的人力物力，足以圍攻日寇，但我們更想使我們自己的領土內，早日土崩瓦解，畢竟還得用我們自己的血肉來拼，所以我們更不能不實地準備，隨時準備着反攻，去作更壯烈的犧牲。

的確，勝利的樞機在握了。不過我們非再以其

期的努力，英勇的戰鬥及壯烈的犧牲，不能保證這千載一時的勝利樞機。所以我們的總戰性，不能保證這共進領袖的指示，「以悲憤壯烈的精神，十倍奮發其過去四年來之堅苦戰鬥之意志，再接再厲，以完成吾人神聖之使命。」

加強銀行管理

銀行是處理通貨和信用的樞機，它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中要占一個樞紐的地位。一國商業銀行的活動，如能和政府的財政密切配合，確可以幫助政府推行健全的戰時財政、金融和物價政策。反之，如果它的活動和政府的財政背道而馳，則又可成為破壞國家財政、金融和物價政策的主要力量。

抗戰以來，我國各地的商業銀行對於戰時金融施政固有不少貢獻，但利用戰時物價上漲的形勢，大舉囤積貨物或提高利率以營厚利，也是目前後方金融界普遍的現象。這種混水撈魚，趁火打劫的勾當，不消說，便是促使後方物價飛漲的一個原因。

近一年來，各地的銀行和銀號都呈現着空前興盛現象。新的時有設立，老的獲利百倍。考其獲利的原由，莫不由於利用民間游資和國家銀行的低利放款，從事囤積貨物和高利放款；而高利放出的款項到了商人手裏，大部分還是拿去囤積居奇的買賣。這種不良的現象實有立加糾正的必要。

最近財政部修正「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對於銀行的行動已有管理規定，如限制新銀行的設立，禁止銀行經營商業，囤積貨物，或設置代理部、貿易部等機構，或以信託名義或另設其他商號自行經營或代客買賣，應能對照下業。惟在消極方面，應請規定還本大額，積極方面，對於運用銀行資金以從事生產建設和產銷押匯一點也沒有具體的辦法，對於發生產建設的管制更沒有適當的打算，這些都是需要財政當局速為計劃的。